

元文宗御書御賜研究 ——以〈永懷〉與〈奎章閣記〉為例^{*}

劉嫻嫻^{**}

提 要

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1328-1329、1329-1332 兩次在位）是元代一位頗具漢文化修養的皇帝。通過前輩學者的研究，文宗擅長書法一事已為學界所瞭解，但以往學者多關注蒙古帝王的漢文化能力，而很少從藝術的角度來考察御書。本文以文宗至順二年（1331）正月三日所書〈永懷二字墨拓本〉卷及〈奎章閣記〉為研究對象，對兩件書法作品的内容、風格以及賞賜對象進行考察，並進一步分析文宗書寫的目的、書法風格的象徵意義以及御書賞賜的政治脈絡，以期解釋作品所傳遞的豐富意涵。

研究顯示，在内容上，〈永懷二字墨拓本〉卷乃《詩經》所言「永言孝思」之義，流露出文宗的孝治思想，而〈奎章閣記〉是一篇論述帝王之道的文字，規勸文宗尊祖訓、戒守成、怡心神。從書法風格來看，這兩件作品都受到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 在位）〈晉祠銘〉的書風影響，文宗通過臨仿唐太宗書法，將自己與古代賢君聯繫在一起，從而提高了自己作為統治者的威望。藉由御書賞賜，文宗在散佈恩澤的同時，也獲取了大臣們的忠誠與感激，此舉不僅有利於文宗塑造忠孝價值觀，還有助於其構建賢明統治者的形象。

關鍵詞：御書、御賜、元文宗圖帖睦爾、奎章閣、永懷、奎章閣記

^{*} 收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4 月 22 日。

本論文是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修讀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感謝導師唐錦騰、陶淑慧老師的指導，本文在研究及寫作中亦得北京故宮博物院郁文韜老師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曉宇老師惠賜寶貴意見，在此向各位老師致以謝忱。最後，特別要感謝兩位審查人，二者悉心校讀全文並提出若干寶貴修改意見，他們精心審閱使得本文避免了一些粗率的推論與錯誤，文章也因此得到調整與完善，著實獲益良多，特此誌謝。惟一切文責由筆者負責。

^{**}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御賜是古代皇帝賞賜臣子綢緞、土地、書畫等物品的行爲。在這些賞賜品中，藝術品——尤其是皇帝的書法「御書」——因其獨特的內涵與價值而成爲御賜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藝術有其獨特的性質，書法以文字爲載體，觀者在欣賞筆墨的同時可以通過文字體會作者的用意，因此相較於其他形式的賞賜，御書的內容更容易被蒙賜者理解，賞賜者的意圖也因此變得清晰。宋太宗（趙炅，939-997；976-997 在位）淳化五年（994）曾御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賞賜呂蒙正（944-1011），以敦促宰相舉賢，「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¹ 由此可見，作爲一種特殊的賞賜方式，御書可以有效傳遞統治者的意圖，進而成爲一種君臣間交流的方式。

作爲皇室文化的一部分，賞賜御書的傳統最早可追溯至漢代，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 5-57 年；25-57 在位）時已有帝王賞賜手書的記載。² 唐代是御書賞賜發展的重要階段，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 在位）曾以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賞賜長孫無忌（594-659）等人。³ 唐太宗此舉或對宋代御書文化產生影響，目前已有學者關注到宋代一些帝王對唐太宗作爲統治者及書法家的推崇，並效仿唐太宗開展一些書法活動。⁴ 御書及御賜在元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天曆二年（1329）春，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1328-1329、1329-1332 兩次在位）在大都創建奎章閣，常在其中與大臣探討法書名畫，⁵ 有時也賞賜他們一些藝術品。文宗的賞賜大致分爲御書賞賜（表一、二）和內府書畫藏

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以清光緒七年〔1881〕浙江書局刊本爲底本，以遼寧圖書館藏手抄宋本參校），卷 36，頁 802。

2 《後漢書》：「（漢光武帝）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紹興本爲底本，以汲古閣本、武英本參校），卷 76，〈循吏列傳〉，頁 2457。

3 《唐會要》：「（貞觀）十八年（644）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據武英殿聚珍本影印），中冊，卷 35，〈書法〉，頁 647。

4 研究參見 Julia K. Murray,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 18 (1986): 49-52; 宋曉希，〈御書賞賜的文治氣象——宋太宗與唐宋御書政治文化的傳承和轉型〉，《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 12 期，頁 13-21。

5 《南村輟耕錄》：「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以武進陶氏影元刻本爲據，參校其他），卷 7，〈奎章政要〉，頁 91。

品賞賜（表三）兩類，這其中又以御書賞賜的內容最為豐富，且獲賜人數最多。「御書」是皇帝書法的統稱，在文宗時期，御書可細分為由皇帝親筆書寫的「狹義上的御書」，以及由詞臣代寫的「廣義上的御書」。「狹義上的御書」是以文宗「親洒宸翰」為前提，⁶常以賦有寓意的兩字組合為內容（表一），在形式上涵蓋拓本與紙本兩類。⁷「廣義上的御書」多為下達命令的公文，包括聖旨、手詔等（表二），即使其中也有文宗親筆書寫的特殊情形，⁸但大部分由詞臣代寫，⁹代寫後「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¹⁰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所討論的「御書」皆為「狹義上的御書」。

回顧前人研究，研究者通過文獻資料整理了元文宗的御書作品，¹¹然而前輩學者多關注的是蒙古帝王的漢文化能力，御書因此被看作是文宗漢文化修養的體現，而較少被當作藝術品進行討論，也因此鮮見學者探究御書的意涵或關注御書

6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縮印），冊77，卷21續稿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202。

7 黃潛在〈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御書〉一文中，將文宗賞賜給哈刺拔都兒的御書分為「御書墨本」與「親筆」兩類，也即拓本與紙本的區別，黃潛說到：「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家藏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御書墨本」兩卷中，一卷為御書拓本〈永懷〉，是文宗「模為墨本以賜近臣」，另一卷則不詳；「親筆」兩卷中，一卷是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時的御筆，另一卷是賜名的御筆。（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御書〉、〈恭跋御書永懷二字〉、〈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201-202。

8 如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時，文宗曾御筆親書。（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頁201。

9 虞集：「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此外，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中提及聖旨和詔書的區別：「聖旨以蒙古文記錄皇帝的命令，詔書則由『史臣』即翰林國史院的文士用漢文起草」，且「手詔的本意是皇帝手寫的詔諭，又演變為以皇帝名義單獨發給某人、表示親近或機密的詔書。後者實際上仍有『詞臣』代言，並非皇帝親自寫作。」（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二集七百種》（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37，據民國整理本影印），卷10，〈跋御筆除丑閏太府太監〉，頁183；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卷10，頁109-158。

10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跋御筆除丑閏太府太監〉，頁183。

11 研究參見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元史叢說の一—〉，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多田印刷株式會社，1969），冊15，頁232-314；神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ついて〉，收入氏著，《神田喜一郎全集》（東京：同朋舍，1983），卷5，頁24-39；Franke Herbert,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 Herbert Franke (Brookfield, Vermont: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CS429, 1994), 28-4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民族研究》，1987年5期，頁67-74；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183-187。

的製作與使用。王正華在研究藝術與政治權力時曾指出：

「繪畫」與「政治權力」之所以可以並列、發生關係，在於畫作被視為人類生產及使用物品中的一類，依不同的畫作而各有生產與使用的脈絡；在某些脈絡中，「政治權力」範疇中的若干要素進入畫作意義產生的網絡，而在二者的互相援引下，畫作被賦予的政治意義及其所在的脈絡得以彰顯……¹²

可見將藝術品放置於特定的生產及使用脈絡中進行立體的考察，有利於探究藝術品的意涵尤其是政治意涵，這避免了將複雜的政治權力等同於政治功能的簡單論斷，從而更好地闡釋宮廷藝術品的意義，但這種考察的前提是需要相關課題不斷完善，以便徵引大量的材料及圖像。¹³所幸的是，學界中已有不少有關文宗朝書畫收藏及藝文活動的研究成果：其中，傅申與姜一涵通過文獻及圖像資料整理出了奎章閣的書畫收藏，¹⁴陳韻如關注到文宗書畫鑑藏的畫史意義，¹⁵石守謙考察了文宗朝藝術與北宋風格的聯繫。¹⁶此外，歷史學者們曾指出文宗登基之初政權正當性不足的問題，及文宗如何運用漢文化去鞏固政權並提升帝王的聲望。¹⁷在此基礎上，Ankeney Weitz 注意到了文宗展示其書畫收藏不僅是一種簡單的娛樂方式，而與宮廷中修辭（rhetorical）問題緊密相關。¹⁸這些研究均為翔實之作，不僅加深了

12 王正華，《藝術、權力與消費：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一個面向》（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頁18。

13 王正華，《藝術、權力與消費：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一個面向》，頁18-68。

14 參見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姜一涵，〈元內府書畫收藏（上）〉，《故宮季刊》，14卷2期（1979冬），頁25-54；姜一涵，〈元內府書畫收藏（下）〉，《故宮季刊》，14卷3期（1980春），頁1-36。

15 參見陳韻如，〈帝王的書閣：元代中後期的皇家書畫鑑藏活動〉，收入陳韻如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236-251；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收入石守謙、葛婉章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266-285。

16 石守謙，〈元文宗的宮廷藝術與北宋典範的再生〉，《中國文化研究學報》，65期（2017.7），頁97-138。

17 相關研究參見 Chi-Ching Hsiao, "Mid-Yuan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 6 of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C.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90-560; John D. Langlois, "Yu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y* 38, no.1 (November 1978): 99-116.

18 詳見 Ankeney Weitz, "Art and Politics at the Mongol Court of China: Tugh Temür's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Artibus Asiae* 64, no.2 (2004): 246.

我們對於此時藝術與文化的瞭解，更是為本文研究文宗御書提供了堅實基礎。

表一、表二彙總了不少元文宗的書法作品，但這些作品多見於文獻記載，傳世之作十分少見。2014年，碑帖鑑定專家馬成名在《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記錄了一件〈元拓孤本元文宗自書、自刻、自拓〈永懷〉二字一卷〉（以下簡稱〈永懷〉）及題跋照片，¹⁹至此學界開始對文宗書法及〈永懷〉有所瞭解，但迄今未見深入的討論。此外筆者在研究中發現，〈永懷〉與文宗另一件書法作品〈奎章閣記〉在製作時間、書法風格等方面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二者皆書於至順二年（1331）正月三日，並受到唐太宗〈晉祠銘〉的書風影響，因此本文在考察〈永懷〉的同時一併檢視〈奎章閣記〉。本文將對兩件御書的內容、風格、書寫目的、展示場景及蒙賜者身份背景進行考察，旨在進一步揭示御書所要傳遞的豐富意涵。

表一 元文宗書法賞賜

品 名	御書年份	蒙賜者	史料來源
〈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正月初三	目前可知共七個賜本：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1. 馬祖常本	
		2. 伯顏本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1，〈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
		3. 仇濟本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3，〈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
		4. 鐸爾直本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5. 朵來本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御書奎章閣記〉
		6. 蘇天爵本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順帝朝賞賜）
〈永懷〉	至順二年正月初三	7. 楊瑀本	（元）王逢，《梧溪集》，卷1，〈敬題楊山居太史所藏文皇帝御書奎章閣碑本後〉（順帝朝賞賜）
		目前可知共四個賜本：	均見元文宗〈永懷〉後康里巎巎題跋（康里巎巎題跋收入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圖2））
		1. 哈剌拔都兒本	
		2. 康里巎巎本	
		3. 趙世安本	
		4. 阿榮本	

19 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183-187。

品 名	御書年份	蒙賜者	史料來源
〈御書〉	天曆二年五月初五	大長公主祥哥剌吉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21,〈端午賜大長公主〉;(元)柯九思,(清)繆荃孫、曹元忠同輯,《丹邱集》,卷3,〈宮詞十五首〉
〈雪月〉	不詳	健篤班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8,〈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雪林〉	不詳	趙世安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37,〈飛龍亭記〉;(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3,〈御書雪林二字賜趙中丞應制〉
〈梅邊〉	至順元年閏七月前	林天麟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4,〈御書贊〉
〈御書〉	不詳	法恩	(元)揭傒斯,收入李夢生點校,《揭傒斯全集》,卷7,〈上在嶺南時居獨秀山壽寧禪寺有近臣寬者里不花自易名法恩願爲上出家祝厘賜御書爲識及即位賜名亦輦眞省吉日侍左右乃以舊所賜御書裝潢請賦〉
〈保寶〉	天曆元年九月文宗登基前	保寶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13,〈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元)揭傒斯,收入李夢生點校,《揭傒斯全集》,卷8,〈保寶御史爲南臺從事時識文宗於潛邸嘗御書其名以賜之因觀宸翰感極成詩〉

表二 元文宗聖旨、手詔等賞賜

品 名	御書年份	蒙賜者	史料來源
手詔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朵來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朵來學士所藏御書後〉(文後附御書原文)
聖旨/手詔	不詳	不詳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4,〈御書贊〉
手詔	不詳	伯顏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1,〈恭題太師秦王所藏手詔〉
手詔	不詳	哈剌拔都兒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賜名哈剌拔都兒御書〉
聖旨	天曆二年五月	哈剌拔都兒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命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剌拔都兒準此天曆二年五月日〉

表三 內府書畫藏品賞賜

品 名	時代	作 者	蒙賜者	史料來源 / 藏地	備 註
〈渭川千畝圖〉	不詳	不 詳	不 詳	(元)揭傒斯,收入李夢生點校,《揭傒斯全集》,卷6,〈奉題近臣所藏天曆御賜渭川千畝圖〉	天曆時期文宗賞賜近臣〈渭川千畝圖〉一幅。
〈曹娥誄辭〉卷	晉	不 詳	柯九思	遼寧省博物館藏,帖上題記	柯九思進,後賜還。
〈鴨頭丸帖〉	晉	(傳)王獻之	柯九思	上海博物館藏,帖上題記	天曆三年正月十二日,賜柯九思。作品上有「臣九思」白文印,與〈曹娥誄辭〉卷後柯九思印章形態一致,或同為柯九思進呈,隨後賜還。
〈定武蘭亭真本〉卷	晉	(傳)王羲之	柯九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帖上題記	柯九思進,後賜還。
〈荊州帖〉 (又稱〈動靜帖〉)	宋	黃庭堅	柯九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帖上題記	柯九思進,後賜還。

二、元文宗御書御製〈永懷〉及〈奎章閣記〉

(一) 永言孝思：元文宗自書、自刻、自拓〈永懷〉二字

元文宗行書〈永懷〉(圖1),長寬約15公分,²⁰1996年9月由美國舊金山何姓藏家購得,現藏美國,碑帖鑑定專家馬成名認為此本是元文宗傳世的孤本作品。²¹該拓本有康里巎巎(1295-1345)、董其昌(1555-1636)、翁方綱(1733-1818)、余集(1738-1828)、馮敏昌(1741-1806)、王澤(1759-1842)、黃易(1744-1802)、楊守敬(1839-1915)、王豫康(活動於19世紀)、張珩(1915-1963)、許思

20 陸心源:「〈永懷〉紙拓本,高四寸八分廣同。」經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建立的「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換算,清制長度4.8寸,合15.36公分。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度量衡轉換工具」,http://doi.airiti.com/LandingPage/NTURCDH/10.6681/NTURCDH.DB_THDL/SERVICE/measure(檢索日期:2021年4月1日);(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收入盧聖輔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據光緒十七年[1891]吳興陸氏本影印),冊13,卷6,〈元文宗永懷二字卷〉,頁542。

21 鑑定意見詳見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187。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趙幹〈江行初雪圖〉卷上楷書「神品上」也被認為是文宗書法,傳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中引吳升《大觀錄》的記載:「元文宗鑑賞,楷書神品二字(本文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趙幹〈江行初雪圖〉,天曆之寶左側為「神品上」三字而非二字),壓天曆之寶於右」,認為吳升所言「不知何據,但極有可能。文宗手跡不多見,與此二字相近者,唯故宮荊浩〈匡廬圖〉軸」。相關研究參見傳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頁53-54。

潛（活動於 20 世紀）題跋，²² 曾經鮑廷博（1728-1814）、²³ 汪士元（1877-1935）、張珩等收藏，作品有元文宗「天曆之寶」、「奎章閣寶」、歸來（活動於 17 世紀）、翁方綱、陸樹聲（活動於 20 世紀）、汪士元、張珩、譚敬（活動於公元 20 世紀）、張文魁（活動於公元 20 世紀）鑑藏印，另有「珍藏秘玩」、「精金美玉」二印。²⁴ 此本經袁中道（1570-1626）《珂雪齋集》、顧復（活動於 17 世紀）《平生壯觀》、陸心源（1838-1894）《穠梨館過眼錄》、端方（1861-1911）《壬寅銷夏錄》、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等文獻記載。²⁵ 〈永懷〉上「天曆之寶」、「奎章閣寶」兩枚印章與〈江行初雪圖〉、〈梅竹聚禽圖〉等真跡上奎章閣鑑藏印的形態一致（圖 2-1、2-2），²⁶ 且作品後康里巎巎、董其昌、翁方綱等人題跋內容可考、書風可信，加之該作品流傳遞藏有序，應為文宗手書的拓本真跡。

根據康里巎巎在作品上的第一段題跋：

上臨唐太宗〈晉祠銘〉，因書永懷二字，親刻之石，乃手印四紙以賜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御史中丞臣趙世安、宣政使臣哈刺八都兒及臣巎巎。臣伏觀宸翰道麗雄強，神采輝映，龍跳虎臥不足喻也。賜與之際，聖恩低徊，復謂之曰：「唯賜卿四人，其石朕已剝去矣。」臣等無任感激，悚懼之至。至順二年正月三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事臣巎巎拜手稽首謹記。（圖 3）

可知在至順二年正月三日這一天，元文宗受到唐太宗〈晉祠銘〉的影響，親書〈永懷〉二字。不僅如此，文宗在書寫後還親自刻石，並手印四個拓本賞賜阿榮

22 以上題跋的記載均出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 183-187。

23 黃易：「《書畫譜》載元文宗臨唐太宗〈永懷〉二字賜巎巎子山。《黃文獻公集》云，文皇以佩刀刻蘆葦根作永懷二字，模賜近臣。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入侍，曾被是賜。此卷亦是斯時所賜。吾友鮑以文寶玩多年，乾隆甲寅（1794）五月從里中寄贈，可感也。」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 185-186。

24 以上鑑藏印的記載均出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 183。

25 （明）袁中道，步問影校注，《游居柿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據天啓四年刻本參校），卷 10，頁 247；（清）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卷 6，頁 33-34；（清）端方，《壬寅銷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信息中心藏稿本影印），冊 1089，卷 8，〈元文宗永懷二字墨拓本〉，頁 394-396；（清）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6，據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仿宋精鈔本影印），卷 4，〈康里巎〉，頁 30；（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刻本影印），冊 381，卷 47，頁 428。

26 關於〈江行初雪圖〉、〈梅竹聚禽圖〉等作品上奎章閣鑑藏印的研究，參見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頁 53-54。

（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趙世安（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哈刺拔都兒（康里巎巎題跋作哈刺八都兒，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²⁷ 康里巎巎，但文宗在賞賜後不久就毀了原石。〈晉祠銘〉，全稱〈晉祠之銘並序碑〉，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所作，此時太宗經歷了征討高句麗的失敗，大軍在班師回京的路上經過並州（今山西太原），²⁸ 在前往晉祠悼念唐叔虞（活動於公元前 11 世紀）後太宗寫下了〈晉祠銘〉，文中他通過緬懷叔虞德政的方式，歌頌了李唐王朝的文治武功。〈晉祠銘〉不僅文辭優美，書法更是流暢自然，這件書法作品吸引著元文宗，他在臨習〈晉祠銘〉後便書〈永懷〉一幅。進一步比較後發現，「永」、「懷」二字取自〈晉祠銘〉中兩個不同的段落（圖 4、5），即知元文宗是在臨習後有所感悟，特取其中「永」、「懷」二字而書，這一點正如翁方綱指出「（永懷）非臨寫連屬成文之比，特文宗自有寓感云爾」。²⁹ 既然如此，文宗為何特書永懷二字？他究竟有何感寓？

筆者注意到哈刺拔都兒曾在蒙賜後與黃潛（1277-1357）鑑賞〈永懷〉，並請黃潛為御書題跋。黃潛的跋文收錄於文集《金華黃先生文集》中，該跋文為解釋〈永懷〉之意提供了信息。黃潛〈恭跋御賜永懷二字〉記載：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刻蘆葦根作永懷二字，³⁰ 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潛，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³¹

27 按，元代虞集《道園學古錄》、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等文獻中都稱其為哈刺拔都兒，因此本文依照多數記載，在寫作中使用哈刺拔都兒一名。（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10，〈天曆聖旨〉，頁 181；（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御書〉、〈恭跋御書永懷二字〉、〈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1-202。

28 貞觀十九年（645），唐太宗親自督陟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市）征伐高麗，但唐朝士兵自七月始攻安市城（今遼寧海城市），至九月不克，於是唐太宗下令班師，于同年十二月抵達並州，並在此逗留了兩個月。（後晉）劉昫等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以清道光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為據，以南宋紹興越州刻本、明嘉靖開人詮刻本參校），卷 3，〈太宗本紀〉，頁 58。

29 見〈永懷〉後翁方綱題跋，圖片見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頁 186。

30 按，黃潛言：「間嘗以佩刀刻蘆葦根作永懷二字」，提示出文宗或在不同場合利用不同材料，書刻〈永懷〉二字並賞賜近臣，這一點承蒙審稿人在審稿時指出，而有關文宗在不同場合利用不同材料書刻〈永懷〉一事，筆者將在日後材料豐富時展開進一步考察。

31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永懷二字〉，頁 201-202。

文中黃潛說到「永懷」是「永言孝思」之義，「永言孝思」取自《詩經·大雅·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³²

這是一首讚美周代統治者能夠效法先人繼承祖德的詩歌，而正是由於這種美德「孝思」，使得周王朝「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孝」同樣是文宗治國的核心理念之一，釋大訢（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在《蒲室集》中曾說：「文皇以孝治天下」，³³而在孝治的實踐過程中，文宗不僅提倡旌表孝子，更是推進了元代丁憂制度的形成。³⁴

既然如此，文宗為何倡導「孝思」呢？對此，陳旅（1288-1343）在〈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一文中解釋到：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人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也，詎止致謹于群玉之所司物而已哉。³⁵

此處陳旅引用了《禮記》的記載，用孝子執玉時「洞洞屬屬」之貌比擬侍君之道，指明要用對待長輩及祖先恭敬、謹慎的態度去奉侍皇帝，可見此時「孝」的概念已超越親情倫理道德之範疇。實際上，孝忠的概念可追溯至《孝經》，其出現將親情倫理上升至具有政治教化功能的普遍道德，成為自漢代以來君臣關係的新

32（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以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為底本），下冊，卷 16，頁 1046-1048。

33（元）釋大訢，《蒲室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390，卷 15，〈魯山銘〉，頁 8b。

34 有關旌表孝子，有文章指出，根據《元史》記載，文宗旌表孝子共計 8 人，而仁宗和順帝旌表人數為 3 人和 2 人，可見文宗時期皇帝旌表孝子的力度是比較大的，見冀雪超，〈元朝對孝的弘揚的歷史軌跡〉，《邯鄲學院學報》，2020 年 2 期，頁 73；有關文宗時期丁憂一事，《元史》記：「天曆二年，詔：『官吏丁憂各依本俗，蒙古色目倣效漢人者，不用。』」部議：『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明），宋濂等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以百衲本為據，以北京圖書館藏原書、北京大學藏一百四十四卷殘洪武本、北京圖書館藏南監本等參校），卷 83，〈選舉志〉，頁 2068。

35（元）陳旅，《安雅堂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398，卷 7，〈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頁 2b-3a。

基礎，《孝經》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³⁶而通過對御書〈永懷〉的分析，可見忠孝的思想在文宗朝之延續，所謂「孝治」，或是文宗借孝子之道來調節君臣關係，並以「孝」為源喚起大臣的忠君意識。

（二）帝王之訓：御書御製〈奎章閣記〉

天曆二年四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1272-1348）奉敕視草而撰寫〈奎章閣記〉一文，³⁷這是一篇與建立奎章閣相關的歷史文獻。在虞集撰寫後，文宗根據此文作〈奎章閣記〉書法一幅。楊瑀（1285-1361）《山居新語·奎章閣記》說到：「至順辛未（二年）孟春三日，御書於奎章閣」，³⁸可知文宗御書的時間是在至順二年，也即虞集撰寫後的兩年。又據《元史》記載「（至順）二年春正月己卯（初三），御製奎章閣記」，³⁹可知〈奎章閣記〉在書寫後被製作成碑，且〈奎章閣記〉的書寫及製作時間與〈永懷〉相同，皆為至順二年正月三日。但由於文宗〈奎章閣記〉的原文及拓片早已不存，迄今對該作品的瞭解主要通過文獻資料。

在對〈奎章閣記〉的內容展開研究前，有必要指出，姜一涵曾對《山居新語》以及《元史》所記載文宗御書的年份感到懷疑。如上文所言，文宗御書是在虞集撰文的兩年後，而此時奎章閣中虞集等人集體辭職、大學士趙世延（1260-1335）遭忌、柯九思（1290-1343）被彈劾，這「已使這位年輕皇帝焦頭爛額、窮於應付，到那時他對奎章閣的興趣已漸冷卻，自然不會將兩年前的〈奎章閣記〉拿來書寫了」。⁴⁰因此姜一涵指出《元史》的記載或許有誤，由於《元史》是根據楊瑀《山居新語》而成，其混淆了楊瑀著述的日期（至順辛未孟春三日）與文宗御製〈奎章閣記〉的日期，所以不論是虞集應制撰寫的〈奎章閣記〉還是文宗的御書，皆成于天曆二年。⁴¹然而，即便如姜一涵所指出文宗在兩年後重書〈奎章閣記〉一事不太尋常，但這並非沒有可能。黃潛在為鐫爾直

36（唐）李隆基注，《孝經》，收入《諸子集成補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據渭南嚴氏重刊宋相臺岳氏本影印），冊1，〈士章第五〉，頁5。

37（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22，〈奎章閣記〉，頁373-374。

38（元）楊瑀，《山居新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錢塘丁氏重刊影元寫本），頁21b。

39（明）宋濂等編，《元史》，卷35，〈文宗本紀〉，頁773。

40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39。

41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38-39。

（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所藏文宗〈奎章閣記〉題跋中說到：「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奎章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⁴² 即知〈奎章閣記〉確實書寫及製作於至順二年正月，與〈永懷〉為同一時間，且黃潛說到「（文宗）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真禁中」，⁴³ 可知御書與御製是連續的行為，文宗書成後作品便被刻石製作，這一點與《山居新語》及《元史》所記頗為一致。

那麼正如姜一涵所疑惑，在奎章閣建立後的兩年，文宗面臨了諸多困難，他為何要在這一天書寫〈奎章閣記〉呢？對此馬祖常（1279-1338）在〈恭贊御書奎章閣記〉中解釋到：

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臣公卿以次進對。少間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今，求其治亂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群成，迺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鑄諸樂石，茲皆萬萬世無疆之慮也。猗歟盛哉！⁴⁴

在馬祖常看來，文宗建立奎章閣後，在其中通過閱覽古文圖書而知古今之事，並求治亂之原，因此此時需要「施於天下」及「戒於群成」，而製碑的原因則是希望「刻文垂訓，萬世是傳」。⁴⁵ 既然如此，〈奎章閣記〉一文有什麼是值得「施於天下」及「戒於群成」呢？實際上，儘管〈奎章閣記〉是一篇開建奎章閣的官方文獻，但它的內容卻更像是一篇勸誡文字，⁴⁶ 論述了帝王之道，乃至許有壬（1287-1364）評價「（〈奎章閣記〉）崇德樂道，頌祖訓，戒守成，遠不軌不物，所以陳王業貽孫謀者，本末周密，帝王之道盡在是矣，誠歷代之大訓。」⁴⁷ 謹錄〈奎章閣記〉全文如下：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

42（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2。

43（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2。

44（元）馬祖常，《石田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757-764，卷 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 6a-6b。

45（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 6b。

46 姜一涵早便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認為「記」一般都是比較客觀的記述，是以廣大的讀者為對象，但虞集卻句句針對文宗，參見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 39。

47（元）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6，卷 71，〈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頁 3a。

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⁴⁸

該文在講述開創奎章閣的歷程之外，流露出深刻的勸誡之意，規勸帝王怡心養神以順應天地，成爲聖明睿智之君。此外，〈奎章閣記〉指出了奎章閣的雙重屬性，它首先是「陳器玩」、「棲圖書」帝王的休憩之所，其性質及意義正如石守謙指出，是一個「推動中國式文治的文化基地」，⁴⁹可從文中「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又知奎章閣是文宗「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的議政之所。儘管兩年中面臨諸多問題，但文宗依舊能「泛應萬變而不窮」，坐居閣中且運籌帷幄，使得宥密、爭臣、侍從有序覲見，君臣共商國是，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如此看來，建立奎章閣不僅是文宗推行文治的象徵，也是文宗政績的體現，這爲〈奎章閣記〉乃至文宗兩年後重書〈奎章閣記〉賦予了深刻的意涵。

根據黃潛的記載：「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⁵⁰可知〈奎章閣記〉在製作後立於禁中。值得提及的是，〈奎章閣記〉製作於正月三日，儘管文獻中沒有太多記載，但筆者猜測其製作或與一週之後文宗的生

48（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22，〈奎章閣記〉，頁373-74。

49 石守謙，〈元文宗的宮廷藝術與北宋典範的再生〉，頁98-99。

50（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202。

辰（正月十一日）相關。⁵¹ 元代皇帝的生辰稱為「天壽節」或「天壽聖節」，是全年最重要的法定節日之一，並享用國家最高級別的儀制。⁵² 是日在京的官員都要詣闕稱賀，⁵³ 朝賀後，帝王則會饗宴諸王、宗親、駙馬、大臣等人，而饗宴的地點，便是位於禁中的大明殿。⁵⁴ 此時〈奎章閣記〉以御書刻石的方式呈現，這將有利於長時間、遠距離、多人數的觀看，公眾性及展示性很強。另一方面，正如許有壬評價文宗御書御製〈奎章閣記〉一事有「擴大訓示百僚」之意，⁵⁵ 即〈奎章閣記〉將通過立碑陳設的方式以擴大對百官的示範作用，石碑的設立需要一定的時機及場合，而天壽節的盛典恰好為御書展示之意提供了最佳場景。

御書刻石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悠遠的傳統，如唐太宗行書〈晉祠銘〉、宋真宗（趙恒，968-1022；997-1022 在位）〈大中祥符頌〉、宋徽宗（趙佶，1082-1135；1100-1126 在位）〈八行八刑條〉。從帝王教言、政令到獎懲條例的製作，可見御書刻石一事很早便被賦予了政治意涵，這一點猶如程章燦在研究宋代御書刻石中指出，「宋代從宋真宗朝開始，將皇帝文字或政令刻石立碑成為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儀式，這一方面是帝王對臣工的誠諭，有昭告永遠之意，另一方面又體現出臣子對帝王的崇敬」。⁵⁶ 元文宗〈永懷〉及〈奎章閣記〉兩件作品不僅體現出與唐宋帝王間的文化連結，更是豐富了御書刻石文化的內容與內涵。

三、〈永懷〉及〈奎章閣記〉書法風格的象徵意義

〈永懷〉是元文宗臨習唐太宗〈晉祠銘〉後書寫而成的，而〈奎章閣記〉的書

51 文宗出生於「（大德）八年（1304）春正月癸亥（十一）」。（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32，〈文宗本紀〉，頁 703。

52 關於元代天壽節的研究，參見馬曉林，《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文本與禮俗》（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74-95；許正弘，〈元朝皇帝天壽聖節考〉，《成大歷史學報》，44 號（2013.6），頁 109-144。

53 陳高華、史衛民，《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 392-393。

54 有關天壽節是日設宴的地點，參見袁冀，〈元代宮廷大宴考〉，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輯 8，頁 116；有關元大都的結構，朱傑說到：「元時大都宮殿，實夾太液池兩岸，東為大內……西為興聖宮隆福宮西御苑……」（朱傑，《元大都宮殿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21），而東邊的宮城中則有大明殿、延春閣等建築；另，有關大明殿的研究，參見朱傑，《元大都宮殿圖考》，頁 23-27；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頁 54-56。

55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3，〈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頁 3a。

56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93。

風，據許有壬〈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描述「文宗皇帝遊心翰墨，天縱之聖，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⁵⁷可知同樣是受到唐太宗了〈晉祠銘〉之影響。由此可知，至順二年正月三日，文宗以〈晉祠銘〉的風格書寫了〈永懷〉與〈奎章閣記〉兩件書法作品，那麼文宗為何這般喜愛唐太宗〈晉祠銘〉呢？

筆者認為，這首先得益於〈晉祠銘〉典雅的書風和經典深刻的文本內容。〈晉祠銘〉雅秀卻不失遒勁的書法體現了唐太宗的書學修養，正如宋代朱長文（1039-1098）評價「（唐太宗）翰墨所揮，道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⁵⁸不僅文辭優美，〈晉祠銘〉更是一篇論述帝王之道的經典教言。文中太宗指出「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圭錫社，寔茂德之攸居」，⁵⁹表明了建國邦業離不開親信貴族、高賢名士輔佐，緊接著太宗又解釋了文德與帝王的威望、以及其與民意和民心的關係，其言：「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⁶⁰可見帝王施行德政是黎民百姓的期望，而令天下所仰望的正是帝王的風範。

其次，元文宗對〈晉祠銘〉的喜愛離不開他對於唐太宗的欽佩，而令元文宗深感欽佩的不僅是作為書法家的唐太宗，更是作為統治者的唐太宗。作為大唐盛世的開拓者，唐太宗一直是後世帝王稱讚和欽佩的對象，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 在位）就十分推崇唐太宗，⁶¹然而相比這些帝王，元文宗卻在一些方面與唐太宗有著更多相似的經歷與感受，例如在登基一事上。唐高祖（李淵，566-635；618-626 在位）建立唐朝後，曾立世子李建成（589-626）為太子，但武德九年（626），時為秦王的李世民在長安城宮城玄武門殺害了自己哥哥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603-626），並成功登上皇位，⁶²這樣的經歷與元文宗非常類似。元文宗是武宗（海山，1281-1311；1307-1311 在位）的次子、元明宗（和世琜，1300-1329；1329 在位）同父異母的弟弟。致和元年八月（1328，文宗登基後改元「天

57（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1，頁 2b。

58（宋）朱長文，何立民點校，《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浙江出版聯合集團，2012，以寶硯山房為底本，以萬曆本、四庫本參校），上冊，卷 9，〈續書斷上〉，頁 281。

59（唐）李世民，角井博解說，福本雅一、山內敏輝釋文，〈晉祠銘〉，收入《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9），冊 36，頁 8-9。

60（唐）李世民，角井博解說，福本雅一、山內敏輝釋文，〈晉祠銘〉，頁 48。

61 宋高宗對於唐太宗的推崇，參見 Murray,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49-52。

62（宋）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以百衲本為據，以北宋閏刻十六行本、南宋閏刻十行印本、汲古閣本等參校），卷 2，〈太宗本紀〉，頁 26。

曆」)，文宗在大都即位，然文宗在即位之初便宣召了禪讓的消息，等候其兄長明宗入大都。⁶³天曆二年七月，文宗北上迎接皇兄，八月在王忽察都與明宗相見，然而明宗在與文宗見面四日後突然暴斃，明宗去世後，文宗在大都再次即位。⁶⁴儘管未有明確的記載，但對於明宗的暴斃，文宗有不可脫卸的責任，而其中傳位之離奇，胡粹中（1535-1625）曾評論「有不敢明言者歟？」⁶⁵弑兄奪位為文宗的再次登基及其政權的正當性招致爭議，⁶⁶但相比之下，唐太宗卻能構建起一個聖明君主的統治形象，乃至成為後世帝王學習及效仿的對象，猶如蘇轍（1039-1112）所評價：「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⁶⁷這或許是令年輕且登基不久的元文宗欽佩的一個原因，而這種欽佩則體現在他對〈晉祠銘〉的臨習與創作中。然而元文宗對於唐太宗的推崇不止於此，除了追摹唐太宗的書風，至順三年（1332）時，元文宗還命奎章閣用蒙古語翻譯《貞觀政要》，這是一本唐太宗與大臣探討治國要道的言論集，且文宗在鋟板模印後賞賜百官，⁶⁸以「俾近戚國人皆得學焉」。⁶⁹

總的來看，〈晉祠銘〉既是唐太宗書法造詣的代表，又是其治世經驗的總結。在臨習〈晉祠銘〉時，元文宗不僅通過書法感受到唐太宗的帝王風采，更重要的是，他藉由文字學習了唐太宗如何治理國家，以及如何彌補政權正當性的不足——國家的穩定、文化的昌盛、社會的富足，這些績效將有助於文宗鞏固政權。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御書〈永懷〉和〈奎章閣記〉在風格上所具有的象徵意

63（明）宋濂等編，《元史》，卷33，〈文宗本紀〉，頁737-734。

64（明）宋濂等編，《元史》，卷33，〈文宗本紀〉，頁737。

65 胡粹中認為文宗得到寶璽的經歷或與史書記載不合，其言：「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於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明）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以江西局本為據，以徐申、劉日梧原刊本參校），卷22，〈三帝之立〉，頁179。

66 有關文宗再次登基及其政權正當性招致爭議的研究，參見 Hsiao, "Mid-Yuan Politics," 490-560; Langlois, "Yu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99-116.

67（宋）蘇轍，〈唐太宗論〉，收入（明）茅坤彙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冊1384），卷153，頁819。

68（明）宋濂等編，《元史》，卷36，〈文宗本紀〉，頁803。

69（元）虞集，《道園類稿》，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198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初復刊元撫州路學刊本影印），冊5，卷17，〈貞觀政要集論序〉，頁485。

義。兩件作品皆取法唐太宗〈晉祠銘〉，通過藝術風格的聯繫性，文宗將自己與前代賢君唐太宗進行比擬，這既彰顯出他成為明君的決心，又提升了他作為統治者的威望，乃至黃潛認為「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⁷⁰可見在黃潛心中，文宗的德行已然超越前代的聖賢君王。

四、御書的蒙賜者

〈永懷〉及〈奎章閣記〉書成後，與之相伴的是刻石、摹拓及賞賜活動。康里巎巎在〈永懷〉題跋中指出了四位賞賜的對象，可原石在賞賜之後就被毀去，因此〈永懷〉在世上僅存四本，這對蒙賜者來講象徵著至上的榮譽。〈奎章閣記〉的墨本則是在加蓋「天曆之寶」、「奎章閣寶」後賞賜「上所知遇者」，⁷¹但與〈永懷〉不同的是，〈奎章閣記〉拓本賞賜的大臣更多，且賞賜的時間跨越文宗及順帝（妥懽帖睦爾，1320-1370；1333-1370 在位）兩朝。那麼這些為皇帝所知遇的蒙賜者都是誰？他們為何能享此殊榮？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的解答。

（一）〈永懷〉的四位蒙賜者

1. 趙世安

趙世安，字伯寧，易州涑水人。⁷²馬祖常曾作〈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一文，以表彰趙世安及其先祖侍君之忠貞，成文後元文宗下令制碑，使之世代相傳。從〈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中可知，趙世安家族自元太祖（鐵木真，1162-1227；1206-1227 在位）時已效忠元朝，其曾祖趙柔（-1236）「在蒙元軍下河北之時，率先投誠，故在元初為顯臣」。⁷³趙世安初「侍武宗皇帝冕服」，⁷⁴有研究

70（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永懷二字〉，頁 201-202。

71（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2。

72 本節對於趙世安及其家世的討論，參考馬祖常〈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元史·文宗》及都劉平〈元散曲家趙世安事跡鉤沉〉一文。（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3，〈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頁 19a-23a；都劉平，〈元散曲家趙世安事跡鉤沉〉，收入《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50-59；（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32-36，〈文宗本紀〉，頁 703-807。

73 都劉平，〈元散曲家趙世安事跡鉤沉〉，頁 50。

74（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3，〈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頁 21a。

者認為其「雖品銜不高，但實是皇帝（武宗）身邊的親臣」。⁷⁵至泰定帝（也孫鐵木兒，1293-1328；1323-1328 在位）時，趙世安追隨文宗於潛邸，後又擁戴其登基，「勤勞夙夜，夷險一心」。⁷⁶文宗入繼大統後，趙世安作為文宗可靠的心腹之一而得到重用，官御史中丞、中書左丞等。⁷⁷

對於製作先德碑一事，馬祖常認為這既是文宗偏愛趙世安的體現，又是「皇帝將勸忠於天下，俾人臣知善後之道」。⁷⁸文宗對趙世安的喜愛不止於此，除了製作先德碑及御賜〈永懷〉外，文宗還曾賞賜其御書〈雪林〉一幅，⁷⁹又在至順元年（1330）時念其翊戴之功，命畫工繪其像，隨後文宗親灑翰墨並「識以寶璽」。⁸⁰

2. 阿榮（1292-1233）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⁸¹《元史》有其傳，儘管記載不多，但知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⁸²是武宗身邊的近臣。泰定年初阿榮出任湖南宣慰使、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後因病辭，文宗登基後重被啓用，初為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天曆二年後，供職於奎章閣學士院、太禧宗禋院。⁸³阿榮盡心國事，常閱覽古書，究前代治亂得失，他曾說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為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⁸⁴

3. 哈剌拔都兒

75 都劉平，〈元散曲家趙世安事跡鉤沉〉，頁 58。

76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3，〈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頁 21a。

77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36，〈文宗本紀〉，頁 804；（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3，〈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頁 19a-23a。

78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3，〈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頁 19b。

79 此事在虞集、馬祖常、揭傒斯等文章中皆有紀錄。從文人的題跋可知，元文宗在臨習秘閣的藏品後，御書「雪林」二字賞賜趙世安，「雪林」的含義，揭傒斯解釋為「政欲清如林上雪」。（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37，〈飛龍亭記〉，頁 621-622；（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2，〈贊御書雪林二字為趙伯寧中丞作〉，頁 25b-26a；（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烏程蔣氏密韻樓藏舊鈔本縮印），冊 77，卷 3，〈御書雪林二字賜趙中丞應制〉，頁 37。

80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21，〈趙中丞畫像贊〉，頁 362-363。

81 本節對於阿榮的討論參考《元史·阿榮》以及許正弘〈元阿榮生卒年重考〉。（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阿榮傳〉，頁 3420-3421；許正弘，〈元阿榮生卒年重考〉，《中國史研究》，2013 年 4 期，頁 203-205。

82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阿榮傳〉，頁 3420。

83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阿榮傳〉，頁 3421。

84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阿榮傳〉，頁 3421。

哈剌拔都兒，文宗登基後曾任翰林學士承旨、宣政史、禮部尚書充奎章閣捧案官等，⁸⁵ 又據黃潛所言，捧案官一職「蓋中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⁸⁶ 從中可看出文宗對哈剌拔都兒青睞有加。哈剌拔都兒出身不凡，其父三寶奴（-1311）在武宗朝榮耀赫奕，深得武宗信賴，曾任翰林學士承旨，後官平章政事、左丞相，至大三年，武宗又冊封其為答剌罕。⁸⁷ 答剌罕是北族官號，據韓儒林研究，此稱號是專用來報私恩的，是褒獎對可汗本人或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因此十分尊貴且享有諸多特權，例如免除賦稅、九罪弗罰等。⁸⁸ 三寶奴曾在立太子一事上堅持立武宗子嗣為太子，並對武宗將皇位授予其弟（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1320；1311-1320 在位）一事提出異議，認為「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⁸⁹ 並「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⁹⁰ 仁宗即位後，以三寶奴「變亂舊章誅之」。⁹¹ 或因三寶奴與武宗間的關係，其子哈剌拔都兒在文宗登基後得以重用，天曆元年（1328）九月「前尚書左丞相三寶奴以罪誅，其二子上都、哈剌拔都兒近侍，命以所籍家貲及制名還之」。⁹² 文宗奪取政權之路坎坷，但自武宗立儲始，哈剌拔都兒的家族便堅定地支持武宗一系，而哈剌拔都兒又在文宗與明宗的對抗中擁戴文宗，這或許是文宗對哈剌拔都兒信賴有加的一個原因。

4. 康里巎巎

康里巎巎，字子山，康里部人。⁹³ 康里巎巎祖父燕真（活動於公元 13 世紀）

85 本節對於哈剌拔都兒及其家世的討論，參考《元史·文宗》、《元史·武宗》、《元史·康里脫脫》、《元史·姦臣》、虞集〈天曆聖旨〉、黃潛〈恭跋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恭跋賜名哈剌拔都兒御書〉、〈恭跋御書永懷二字〉等史料。（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22、23、32、138、250，頁 477-508、509-534、703-725、3321-3326、4576-4577；（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10，〈天曆聖旨〉，頁 181；（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恭跋賜名哈剌拔都兒御書〉、〈恭跋御書永懷二字〉、〈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1-202。

86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頁 201。

87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23，〈武宗本紀〉，頁 523。

88 韓儒林，〈蒙古答剌罕考〉，收入氏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23-53。

89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8，〈康里脫脫傳〉，頁 3324。

90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8，〈康里脫脫傳〉，頁 3324。

91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205，〈姦臣列傳〉，頁 4576-4577。

92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32，〈文宗本紀〉，頁 713。

93 本節對於康里巎巎及其家世的討論參考《元史·不忽木》、《元史·康里巎巎》等史料。（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0、143，頁 3163-3173、3413-3417。

由莊聖太后（唆魯禾帖尼，1190-1252）撫養長大，隨侍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 在位）于藩邸，征戰有功。⁹⁴ 燕真之子、康里巎巎的父親不忽木（1255-1300），一名時用，字用臣，曾仕世祖、成宗（鐵穆耳，1265-1307；1294-1307 在位）二朝，深得帝王信賴，官平章政事、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1298）特命行御史中丞事，兼領侍儀司事。⁹⁵ 不忽木的兒子康里巎巎長襲宿衛，少時受到了理學家許衡（1209-1281）及父兄影響，對漢文化領悟頗深，博學多識。⁹⁶ 康里巎巎受皇帝欣賞與重用，官集賢待制、秘書監丞、秘書太監、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順帝時升奎章閣大學士知經筵事、翰林學士承旨等。⁹⁷ 康里巎巎身居高位亦卓有藝名，虞集稱其「書法妙天下」，⁹⁸ 尤其以行楷書、草書見長，康里巎巎亦曾以書畫進諫于順帝。⁹⁹

（二）〈奎章閣記〉的蒙賜者

1. 鐸爾直

至順二年正月〈奎章閣記〉製作完成後，文宗將拓本賞賜朝中大臣，鐸爾直于同年秋冬之際獲贈。得到賜本後，鐸爾直請黃潛爲之題跋，跋文中黃潛說到：

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¹⁰⁰

加蓋寶璽的〈奎章閣記〉賜本異常珍貴，因此「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鐸爾直就是享此殊榮的蒙賜者之一。

94（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0，〈不忽木傳〉，頁 3163-3164。

95（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0，〈不忽木傳〉，頁 3169、3172。

96（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馬祖常傳〉，頁 3413。

97（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馬祖常傳〉，頁 3413-3414。

98（元）虞集，《道園類稿》，冊 6，卷 35，〈題李重山所藏巎子山墨跡〉，頁 163。

99（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43，〈馬祖常傳〉，頁 3413-3417。

100（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頁 202。

鐸爾直，¹⁰¹又作多爾濟，¹⁰²述律氏，又作舒嚕氏，¹⁰³字存道，¹⁰⁴又作從道，¹⁰⁵官至雲南都元帥。述律為遼代貴族之姓，其姓「系出梁武帝」，¹⁰⁶遼亡入金後，金人改其姓為石抹，¹⁰⁷又作舒穆嚕，¹⁰⁸意為臧獲（奴婢）之意，¹⁰⁹後鐸爾直請于朝，朝廷遂復其姓「述律」。¹¹⁰鐸爾直以忠孝文武而稱于朝，他曾為平定雲南一事做出巨大貢獻，¹¹¹又在文宗登基之初平定晉、冀、關、陝等地的叛亂中立下功勞，「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¹¹²可知鐸爾直是擁戴文宗的中堅力量。

鐸爾直文武兼備，能征慣戰之外亦備文藝之才。天曆二年文宗開奎章閣後，冬十月「鐸爾直作頌以獻」，¹¹³此外，在平定雲南凱旋而歸後，鐸爾直向文宗進獻〈平雲南頌〉書法一幅。¹¹⁴鐸爾直所進獻的書法早已不存，但上海博物館藏魏了翁（1178-1237）書〈文向帖〉後有鐸爾直題跋，從中可窺其書法風貌（圖6）。鐸爾直與柳貫（1270-1342）、虞集、陳旅、許有壬、胡助（1278-1355）、吳師道（1283-

101 本節對於鐸爾直及其家世的研究，參考陳基〈書石抹氏家譜後〉、虞集〈跋蕭氏家世事狀〉、陳旅〈舒嚕復舊氏序〉、〈書舒嚕從道詩卷後〉等史料。（元）陳基，《夷白齋稿》，收入《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據上海涵芬樓影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影印），冊554，外集，〈書石抹氏家譜後〉，頁41-42；（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蕭氏家世事狀〉，頁195；（元）陳旅，《安雅堂集》，卷13，〈書舒嚕從道詩卷後〉，頁7a-7b、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5a-26b。

102 （元）王沂，《伊濱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冊1208，卷18，〈石室書院記〉，頁546-547。

103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6b。

104 （元）王沂，《伊濱集》，卷18，〈石室書院記〉，頁547。

105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13，〈書舒嚕從道詩卷後〉，頁7a-7b。

106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6a。正因「系出梁武帝」，因此元人文集中又稱鐸爾直為蕭存道或蕭從道。（元）吳師道，《禮部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據文淵閣本影印），冊173，卷1，〈鶴野詞為蕭存道元帥作〉，頁8b-9a；（元）柳貫，《待制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冊1210，卷3，〈送蕭從道還蜀歌并序〉，頁228-229。

107 （元）陳基，《夷白齋稿》，外集，〈書石抹氏家譜後〉，頁41。

108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6b。

109 （元）陳旅，《安雅堂集》，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5a。

110 （元）陳基，《夷白齋稿》，外集，〈書石抹氏家譜後〉，頁41；（元）陳旅，《安雅堂集》，卷6，〈舒嚕復舊氏序〉，頁25a-26b。

111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跋平雲南頌〉，頁202。

112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蕭氏家世事狀〉，頁195。

113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御書永懷二字〉，頁202。

114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蕭存道平雲南詩卷後〉，頁196；吳師道，《禮部集》，卷8，〈蕭存道元帥平雲南頌後題跋〉，頁9b-10a；（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跋平雲南頌〉，頁202。

1344)、周伯琦(1298-1369)等文人皆有交遊。

2. 朵來

朵來，文宗時期曾任中書左侍郎、奎章閣承制學士、侍書學士，順帝時任工部尚書。¹¹⁵ 朵來高祖朮赤台(活動於公元12世紀)，兀魯兀台氏，其率部歸順元太祖，在太祖平定怯列、乃蠻等部落建有功勳，是蒙古國建國功臣之一。¹¹⁶ 根據姜一涵的研究，朵來家族自朮赤台至朵來四世，共九人均為郡王，可知朵來為元宗室。¹¹⁷ 除了御製〈奎章閣記〉外，朵來還藏有御書一幅，是關於宣諭兩都守把城門的御書。¹¹⁸

3.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號石田，雍古部，回鶻人。¹¹⁹ 馬祖常延祐年間入仕，仕仁宗、英宗(碩德八剌，1302-1323；1320-1323在位)、泰定帝、文宗、順帝五朝，官翰林直學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御史中丞等。¹²⁰ 至順二年十一月時，馬祖常拜治書侍御史，遷侍御史，進中奉大夫，文宗在賞賜內宴服、金玉腰帶的同時賞賜其〈奎章閣記〉一本，馬祖常得到賜本後作〈恭贊御書奎章閣記〉一

115 本節對於朵來的生平研究，參考《元史·朮赤台》及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等文。(明)宋濂等編，《元史》，〈朮赤台傳〉，卷120，頁2962-2963；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109-110。此外，朵來的官職分別見(五代)趙幹，〈江行初雪圖〉後的題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畫像檢索，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1(檢索日期：2021年4月1日)；(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題朵來學士所藏御書後〉，頁194；(明)宋濂等編，《元史》，卷42，〈順帝本紀〉，頁897。

116 (明)宋濂等編，《元史》，卷120，〈朮赤台傳〉，頁2962。

117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頁109。

118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0，〈抄錄御書〉、〈題朵來學士所藏御書後〉，頁194-195。

119 本節對於馬祖常的生平研究，參考《元史·馬祖常》、蘇天爵〈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及許有壬〈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等史料。(元)蘇天爵，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代真本文集彙刊抄本為據，以李木齋藏本、適園叢書本參校)，卷9，〈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頁138-145；(元)許有壬，《至正集》，卷46，〈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頁7a-12a；(明)宋濂等編，《元史》，卷143，〈馬祖常傳〉，頁3411-3413。

120 (元)蘇天爵，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9，〈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頁138-145。

文，¹²¹ 文中他說到文宗〈奎章閣記〉的拓本十分珍貴，因此要「寶藏私家，以遺子孫」，¹²² 御書賞賜是一份極大的榮譽，馬祖常無以回報，因此只能「糜軀銜忠，罔極覆燾」。¹²³

4. 仇濟（活動於公元 14 世紀）

仇濟，字公度，由於文獻資料不多，其生平及家世尚待進一步考察，目前僅知其曾任戶部郎中、懷慶路總管，¹²⁴ 與胡助、馬祖常、許有壬等人有交遊，同時有文藝之才並喜愛書畫收藏。¹²⁵ 許有壬在〈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中說到：「墨本頒賜，止及大臣……此則懷慶路總管臣仇濟為戶部郎中時霑賜本也，屬臣有壬識其末……。」¹²⁶ 儘管許有壬沒有明確記載，但順帝至元二年（1336）的賞賜皆「頒賜講官」，¹²⁷ 即皇帝經筵進講的官員，而仇濟卻為戶部郎中，因此本文推測，仇濟所得為文宗賜本可能性大。

5. 伯顏（1280-1340）

許有壬記載「太師秦王」還藏有一本〈奎章閣記〉，此處「太師秦王」應指元末大臣伯顏。¹²⁸ 伯顏，蔑儿乞惕部，曾祖探馬哈兒（活動於 12 世紀）給事宿位，祖父稱海（活動於 13 世紀）從憲宗（蒙哥，1209-1259；1251-1259 在位）伐宋，父親錦濟勒（活動於 13 世紀）總宿衛興盛太后宮。¹²⁹ 伯顏的出身為「幹脫古忒幹勒」，「忒幹勒」是奴隸的意思，「幹脫古」意味「老的」，「幹脫古忒幹勒」也即

121 (元)蘇天爵，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 9，〈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頁 142；(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46，〈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頁 9b。

122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 6b。

123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 6b。

124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3，〈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頁 3a。

125 (元)胡助，《純白齋類稿》，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1214，卷 19，〈仇公度山林小像贊〉，頁 668；(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10，〈題仇公度總管所藏李伯時六駿圖〉，頁 10a-10b、卷 28，〈題仇公度總管首陽采薇圖〉，頁 5a。

126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3，〈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頁 2b-3a。

127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2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頁 477。

128 本節對於伯顏及其家世的討論以馬祖常〈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元史·伯顏》等史料為基礎。(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4，〈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頁 1b-8b；(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38，〈伯顏傳〉，頁 3335-3339。

129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14，〈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頁 6a。

「老奴隸」、「世僕」，他們與成吉思汗及皇族間有著親密的關係，¹³⁰ 周良宵認為，也正是這種親密的關係，使得幹脫古字幹勒以此為自豪，而這個集群的人更是世代相傳，元朝權要很大部分把持在他們手裡。¹³¹

這樣的出身使得伯顏少時便得武宗青睞，文宗時更是官爵顯赫，官御史大夫、中書左丞相等。¹³² 文宗去世後，順帝即位初便封伯顏為「太師秦王」，¹³³ 伯顏獲得「太師秦王」這一稱號是在元統元年（1333）十一月至至元六年（1340）二月間，¹³⁴ 因此伯顏請許有壬題跋〈奎章閣記〉的時間也此期間。然伯顏獲得〈奎章閣記〉的時間應在文宗時期，因為許有壬題跋中說到：「（文宗）開奎章閣書製文刻石閣中，摹本出天下聳觀，揭如日月雲漢之貴萬物也，當時霑賜非殊眷不與，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奉賜本俾臣有壬識之。」¹³⁵ 其指明了「當時霑賜非殊眷不與」，加上上文所述順帝的賞賜皆「頒賜講官」，¹³⁶ 故伯顏本〈奎章閣記〉為文宗御賜的可能性較大。此外，伯顏另藏有文宗手詔一份。¹³⁷

綜上所述，〈永懷〉及〈奎章閣記〉的拓本賞賜了趙世安、朵來、康里巎巎、哈剌拔都兒、鐸爾直、馬祖常、朵來、伯顏和仇濟等諸位大臣。通過以上對兩件御書蒙賜官員的分析，可知文宗在賞賜時十分看重官員身份。這些蒙賜者大多為蒙古、色目族等少數民族官員，其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如阿榮、朵來、馬祖常、鐸爾直等；也有一些官員，他們的家族與皇室有著緊密且特殊的關聯，如哈剌拔都兒、伯顏等，這些蒙賜者皆是對朝政具有影響力的高級官員。值得提及的是，由於此時鑑賞之風興盛，大臣們在得到御賜後，會親自或邀請文人為作品題跋，題跋者在題寫時體會並解釋御書的意涵，同時也感謝文宗無限的恩寵。由於賞賜

130 參見周良宵，〈元代的皇權和相權〉，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上冊，頁348-349。

131 周良宵，〈元代的皇權和相權〉，頁350。

132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13，〈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頁3b-4b。

133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13，〈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頁4b。

134 馬祖常〈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元統元年六月，今上踐祚，以翼戴定策之勳，越二日，拜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十一月，改封秦王……。」（〔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13，〈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頁4b。）然而，至元六年（1340）二月，順帝因伯顏「不能安分，專權自恣」降其官為河南行省左丞相，見（明）宋濂等編，《元史》，卷40，〈順帝本紀〉，頁854。

135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1，〈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頁2b。

136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頁477。

137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1，〈恭題太師秦王所藏手詔〉，頁1b-2a。

「非殊眷不與」，¹³⁸ 因此受到賞賜的人皆表達出「天德何報，縻軀銜忠」、¹³⁹ 「永懷忠貞、以報天德」等回應。¹⁴⁰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研究禮物關係時，看到了「由贈品交換的對稱性逐步轉向作為政治權利構成基礎的夸適性再分配的不對稱性」的方面，¹⁴¹ 此時由於權勢的滲入，雙方已偏離了平等互惠的交換原則，因此當收禮方無法還禮時，此種贈禮往往是以感激、效忠、尊敬、道義責任等等象徵形式償還。¹⁴² 從這個角度來看，元文宗的御書御賜亦有與之相適應的部分，通過御書賞賜散佈恩澤，元文宗獲得了大臣們的忠誠和感激，御書御賜也因此成為調解君臣關係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大臣在題跋中稱讚文宗的聖德與聖行，如黃潛所言：「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屬于四方，將使中林免置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¹⁴³ 又如許有壬題跋：「帝王之德業，雖不系乎書，然寸心之微，眾欲攻之。不惑聲色，則荒游畋。萬機之暇，誠絕眾欲。深宮靜几，寓意乎書。心正筆正，出治之源，於是乎清矣。」¹⁴⁴ 題跋者在鑑賞書法之餘，肯定了文宗的德行與清政，御書賞賜也因此幫助文宗實現了聖君形象的構建。

（三）至元二年的賞賜——兼談元文宗御書御賜對順帝之影響

〈奎章閣記〉的內容堪稱帝王之訓，其拓本在順帝時期依然有賞賜，而賞賜的時間約在至元二年左右，蒙賜者有蘇天爵（1294-1352）及楊瑀等。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等，順帝朝時還曾擔任奎章閣授經郎一職。¹⁴⁵ 文宗去世後，奎章閣的文治精神在順帝即位之初依舊流淌，至元二年時，順帝再次摹拓並賞賜經筵官〈奎章閣記〉。蘇天爵在蒙賜時說到：「學士臣請模閣記，識以『奎章』、『天曆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

138（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1，〈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頁 2b。

139（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 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 6b。

140（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4，〈御書贊〉，頁 81-82。

141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蔣梓驊譯，《實踐感》（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頁 194。

142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譚立德譯，《實踐理性》（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55、167。

143（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頁 202。

144（元）許有壬，《至正集》，卷 71，〈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頁 2b-3a。

145 本節對於蘇天爵的生平研究以《元史·蘇天爵》為基礎，並參考孫克寬，〈元儒蘇天爵學行評述〉、陳高華、孟繁清，蘇天爵《滋溪文稿》前言部分。參見（明）宋濂等編，《元史》，卷 183，〈蘇天爵傳〉，頁 4224-4227；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頁 382-413；陳高華、孟繁清，《滋溪文稿》前言部分，頁 1-27。

賜焉。」¹⁴⁶ 可知順帝賞賜的拓本上依然鈐有「奎章閣寶」、「天曆之寶」鑑藏印。另一蒙賜者楊瑀，字元誠，杭州人，自號竹西居士。¹⁴⁷ 儘管沒有明確的紀年，但根據王逢（1319-1388）〈敬題楊山居太史所藏文皇帝御書奎章閣碑本後〉的題跋「先皇龍鳳姿，談笑夷內難」，¹⁴⁸ 可知楊瑀獲賜時文宗已過世，加之楊瑀在文宗朝並沒有受到重用，直至順帝登基才入朝做官，¹⁴⁹ 因此推測楊瑀本與蘇天爵本皆為順帝賞賜，而賞賜楊瑀的原因，根據王逢所言「璽封賜臣瑀，豈是世所玩。為爾忠義心，可與金石貫」，¹⁵⁰ 可知是順帝為了褒獎楊瑀忠心。¹⁵¹

順帝至元時期賞賜蘇天爵、楊瑀〈奎章閣記〉墨本以褒獎二者忠心，此舉頗得文宗之傳統。與文宗相仿，元順帝亦喜愛翰墨，並多次賞賜近臣御書。¹⁵² 至正年間，順帝曾御書〈明良〉二字賞賜扎刺爾公即是一例，¹⁵³ 扎刺爾公即朵爾直班（1315-1354），字惟中，木華黎（1170-1223）的七世孫。¹⁵⁴ 木華黎曾擔任元太祖的怯薛，功勳卓著，其家族成員又為元代官僚組織的最高層。¹⁵⁵ 顯赫的出身和忠

146 (元)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28，〈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頁 477。

147 本節對於楊瑀的生平研究以楊維禎〈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楊公神道碑〉為基礎，並參考楊國彭〈《山居新語》作者楊瑀生平考述〉一文。(元)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縮印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舊鈔本），冊 79，卷 23，〈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楊公神道碑〉，頁 177-178；楊國彭，〈《山居新語》作者楊瑀生平考述〉，收入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輯 11，頁 12-21。

148 (元) 王逢，《梧溪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冊 406，卷 1，〈敬題楊山居太史所藏文皇帝御書奎章閣碑本後〉，頁 10a。

149 楊國彭，〈《山居新語》作者楊瑀生平考述〉，頁 14-18。

150 (元) 王逢，《梧溪集》，卷 1，〈敬題楊山居太史所藏文皇帝御書奎章閣碑本後〉，頁 10b。

151 順帝褒獎楊瑀的原因或與楊瑀協助順帝剷除丞相伯顏及其勢力有關，根據楊國彭的研究，至元元年（1335）時，順帝著手消滅伯顏的勢力，而楊瑀在此過程中功不可沒，順帝因為楊瑀有謀略，每次皆與他商議國事。至元六年（1340）楊瑀負責起草罷黜伯顏的詔書，並因此立下功勞得順帝賞識，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太史院同僉等。參見楊國彭，〈《山居新語》作者楊瑀生平考述〉，頁 17-18。

152 有關順帝御書的研究，參見 Herbert Franke,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28-41.

153 (元)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明良二字〉，頁 201。

154 朵爾直班，《元史》有其傳。其侍奉文宗時年僅十四，授工部郎中；順帝時期任奎章閣供奉、承制、侍書學士，至正元年（1341）順帝罷奎章閣，朵爾直班遂為翰林學士同知經筵事，而根據黃潛「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又知御書〈明良〉的賞賜應在順帝至正元年之後。(明) 宋濂等編，《元史》，卷 139，〈朵爾直班傳〉，頁 3355-3357；(元)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明良二字〉，頁 201。

155 更多研究詳見蕭啟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心是朵爾直班得到〈明良〉的原因，¹⁵⁶而順帝賞賜之意則是希望作為股肱之臣的朵爾直班與皇帝休戚與共，以為「君臣之一體也」。¹⁵⁷文宗將御賜視為塑造忠孝價值及調解君臣關係的重要一環，以上可知此舉對順帝亦有影響。

五、結論

至順二年正月三日，元文宗取法唐太宗〈晉祠銘〉的風格，親書〈永懷〉及〈奎章閣記〉兩件作品，二者皆在書寫後刻於石上，隨後文宗將拓本賞賜近臣。本文首先藉由御書題跋及其他文獻資料，對御書的內容及風格的象徵意義進行考察。研究顯示，〈永懷〉二字乃《詩經·下武》中所言「永言孝思」之義，流露出文宗「孝治」的治國思想，但此時的「孝」已遠超親情倫常之範疇，被賦予了更為深刻的含意，是忠孝一體的表現，文宗以此喚起了大臣的效忠意識。〈奎章閣記〉是一篇論述帝王之道的文字，規勸文宗尊祖訓、戒守成、怡心神，且文中提示出奎章閣在庋藏書畫外還具有相應的政治功能，它是文宗「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的議政之處，可見奎章閣不僅是文化與藝術的象徵，更是文宗執政的象徵，這便賦予了〈奎章閣記〉深刻的意涵。兩件御書從風格上看，都受到了唐太宗〈晉祠銘〉的影響，這不僅反映出文宗對〈晉祠銘〉書法和文采的欣賞，也暗示了他對唐太宗作為統治者的敬佩。弑兄奪位的登基經歷將元文宗與唐太宗聯繫在一起，文宗臨習〈晉祠銘〉不僅是提高書學素養的過程，更是學習唐太宗治國經驗及彌補政權正當性不足的過程。而藉由書法學習，文宗在藝術風格上將自己與前代聖主聯繫在一起，這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威望，並彰顯了他成為明君的決心與努力。

其次，本文對兩件御書刻製成碑後的摹拓賞賜活動及蒙賜人員進行研究。研究顯示，蒙賜的大部分官員身居高位，他們之中既有皇親貴族之後，也包含元勳世臣子弟，皆是對朝政具有影響力之人。御書成為了一種帝王與這些高層官員交流的方式，這種交流一方面通過帝王賞賜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展開，御書的意涵通

司，1983），頁 141-230。

156 黃潛：「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明良二字〉，頁 201。

157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1 續稿 18，〈恭跋御書明良二字〉，頁 201。

過賞賜滲透至朝中高級官員，成為文宗塑造忠孝價值及其構建聖君形象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溝通是藉由御書題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呈現，文宗在賞賜御書後，蒙賜者往往會在御書上自書或邀請文人來書寫跋文，這些跋文中一方面表達出「天德何報，縻軀銜忠」等感想，¹⁵⁸一方面又感嘆文宗「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的聖主形象。¹⁵⁹御筆書法作為帝王賞賜藝術品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不只是一種帝王崇尚風雅的個人行為，誠如王正華在研究宋徽宗賞賜貴戚朝臣書畫時說到，這是一種通過被觀看及賞賜的儀式而形成的君臣默契與共識。¹⁶⁰而在元文宗御書賞賜一事中，文宗提倡的忠孝價值及其所構建的聖君形象通過賞賜進一步向高層官員滲透，官員則通過題跋對御書的內容進行闡釋並感謝帝王的恩澤，在這一來一往中不僅完成了「君臣間的默契行為」，更是豐富了御書自身的意涵。

158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8，〈恭贊御書奎章閣記〉，頁6b。

159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續稿18，〈恭跋御書永懷二字〉，頁201-202。

160 王正華：「帝王賞賜臣下本是君臣恩義交換關係中較具帝王主控性及隨意性的一種，徽宗賞賜御筆書畫，遂將此關係連結至文化範疇。就在多重的文化脈絡中，徽宗朝畫作的政治意涵透過集體被觀看、賞賜書畫的儀式在貴戚、朝臣中成為可能的共同認知，達成徽宗主導的君臣關係。」參見王正華，〈聽琴圖的政治意涵：徽宗朝院畫風格意義網絡〉，《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期（1998.3），頁108。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以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為底本。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紹興本為底本，以汲古閣本、武英本參校。
- (唐)李世民，角井博解說，福本雅一、山內敏輝釋文，〈晉祠銘〉，收入《中國法書選》，冊36，東京：二玄社，1989，
- (唐)李隆基注，《孝經》，收入《諸子集成補編》，冊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據渭南嚴氏重刊宋相臺岳氏本影印。
- (後晉)劉昫等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以清道光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為據，以南宋紹興越州刻本、明嘉靖聞人詮刻本參校。
-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據武英殿聚珍本影印。
- (宋)朱長文，何立民點校，《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浙江出版聯合集團，2012，以寶硯山房為底本，以萬曆本、四庫本參校。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以清光緒七年(1881)浙江書局刊本為底本，以遼寧圖書館藏手抄宋本等參校。
- (宋)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以百衲本為據，以北宋閩刻十六行本、南宋閩刻十行印本、汲古閣本參校。
- (元)王沂，《伊濱集》，收入《四庫全書》，冊12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王逢，《梧溪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406-40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吳師道，《禮部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冊173-1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柯九思，(清)繆荃孫、曹元忠同輯，《丹邱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稿本影印。
- (元)柳貫，《待制集》，收入《四庫全書》，冊12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胡助，《純白齋類稿》，收入《四庫全書》，冊12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冊757-7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 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冊 2-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 陳旅,《安雅堂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397-3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
- (元) 陳基,《夷白齋稿》,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冊 550-55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據上海涵芬樓影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影印。
- (元)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以武進陶氏影元刻本為據,參校其他。
- (元)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7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烏程蔣氏密韻樓藏舊鈔本縮印。
- (元) 揭傒斯,李夢生點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以豫章叢書本為據,詩集部分以四部叢刊、海山仙館本參校。
- (元)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7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縮印。
- (元) 楊瑀,《山居新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錢塘丁氏重刊影元寫本。
- (元)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縮印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舊鈔本。
- (元)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二集七百種》,上海:商務印書出版社,1937,據民國整理本影印。
- (元) 虞集,《道園類稿》,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5-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198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初復刊元撫州路學刊本影印。
- (元) 蘇天爵,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代真本文集彙刊抄本為據,以李木齋藏本、適園叢書本等參校。
- (元) 釋大訢,《蒲室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3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文淵閣本影印。
- (明) 宋濂等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以百衲本為據,以北京圖書館藏原書、北京大學藏一百四十四卷殘洪武本、北京圖書館藏南監本等參校。
- (明) 茅坤彙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四庫全書》,冊 13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影印。
- (明) 袁中道,步問影校注,《游居柿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據天啓四年刻本參校。
- (明)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以江西局本為據,以徐申、劉日梧原刊本參校。

-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刻本影印。
-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收入盧聖輔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13,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據光緒十七年(1891)吳興陸氏本影印。
-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信息中心藏稿本影印。
- (清)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6,據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仿宋精鈔本影印。

近代論著

- 王正華,〈《聽琴圖》的政治意涵:徽宗朝院畫風格意義網絡〉,《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期,1998年3月,頁 77-122。
- 王正華,《藝術、權力與消費: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一個面向》,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
-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蔣梓驊譯,《實踐感》,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譚立德譯,《實踐理性》,北京:三聯書店,2007。
- 石守謙,〈元文宗的宮廷藝術與北宋典範的再生〉,《中國文化研究學報》,65期,2017年7月,頁 98-138。
- 朱偁,《元大都宮殿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宋曉希,〈御書賞賜的文治氣象——宋太宗與唐宋御書政治文化的傳承和轉型〉,《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12期,頁 13-21。
- 周良宵,〈元代的皇權和相權〉,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上冊,頁 343-374。
- 姜一涵,〈元內府書畫收藏(上)〉,《故宮季刊》,14卷2期,1979年冬季,頁 25-54。
- 姜一涵,〈元內府書畫收藏(下)〉,《故宮季刊》,14卷3期,1980年春季,頁 1-36。
-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 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 袁冀,〈元代宮廷大宴考〉,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輯 8,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6-131。
- 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
- 馬曉林,《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文本與禮俗》,上海:中西書局,2018。
- 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卷 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09-158。

- 許正弘，〈元阿榮生卒年重考〉，《中國史研究》，2013 年 4 期，頁 203-205。
- 許正弘，〈元朝皇帝天壽聖節考〉，《成大歷史學報》，44 號，2013 年 6 月，頁 109-144。
- 都劉平，〈元散曲家趙世安事跡鉤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50-59。
- 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 陳高華、史衛民，《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 陳得芝，〈元文宗在建康〉，《西部蒙古論壇》，2012 年 3 期，頁 10-16。
- 陳韻如，〈帝王的書閣：元代中後期的皇家書畫鑑藏活動〉，收入陳韻如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236-251。
- 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收入石守謙、葛婉章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66-285。
-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 程章燦，《石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楊國彭，〈《山居新語》作者楊瑀生平考述〉，收入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輯 11，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頁 12-21。
- 冀雪超，〈元朝對孝的弘揚的歷史軌跡〉，《邯鄲學院學報》，2020 年 2 期，頁 71-75。
- 蕭啓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141-230。
- 韓儒林，〈蒙古答剌罕考〉，收入氏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23-53。
- 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民族研究》，1987 年 5 期，頁 67-74。
- 《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9，冊 36。
- 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元史叢說の一—〉，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多田印刷株式会社，1969，冊 15，頁 232-314。
- 神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ついて〉，收入氏著，《神田喜一郎全集》，東京：同朋舍，1983，卷 5，頁 24-39。
- Franke, Herbert.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28-41. Brookfield, Vermont: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CS429, 1994.
- Hsiao, Chi-Ching. "Mid-Yuan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 6 of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C. Twitchett, 490-5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urray, Julia K.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Bulletin of Sung and Yüan Studies* 18 (1986): 41-59.

Langlois, John D. "Yu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y* 38, no. 1 (November 1978): 99-116.

Weitz, Ankeney. "Art and Politics at the Mongol Court of China: Tugh Temür's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Artibus Asiae* 64, no. 2 (2004): 243-280.

網路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度量衡轉換工具」，http://doi.airiti.com/LandingPage/NTURCDH/10.6681/NTURCDH.DB_THDL/SERVICE/measure，檢索日期：2021年4月1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畫像檢索，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1，檢索日期：2021年4月1日。

圖版出處

- 圖 1 元至順二年（1331），元文宗，〈「永懷」二字墨拓本〉卷，局部，美國私人藏家藏。圖版取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 25。
- 圖 2-1 奎章閣收藏印「天曆之寶」（從左至右）：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圖〉卷「天曆之寶」印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梅竹聚禽圖〉軸「天曆之寶」印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至順二年，元文宗，〈「永懷」二字墨拓本〉卷「天曆之寶」印章，美國私人藏家藏。圖版取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 25。
- 圖 2-2 奎章閣收藏印「奎章閣寶」（從左至右）：宋，〈梅竹聚禽圖〉軸「奎章閣寶」印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宋徽宗〈蠟梅山禽圖〉軸「奎章閣寶」印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至順二年，元文宗，〈「永懷」二字墨拓本〉卷「奎章閣寶」印章，美國私人藏家藏。圖版取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 25。
- 圖 3 元至順二年、至順三年（1332），康里巎巎，跋〈「永懷」二字墨拓本〉卷，美國私人藏家藏。圖版取自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 183。
- 圖 4 唐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晉祠銘〉，局部，山西省太原市晉祠貞觀寶翰亭藏。圖版取自《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9，冊 36，頁 26、53。
- 圖 5 唐太宗〈晉祠銘〉「永」、「懷」二字，局部，山西省太原市晉祠貞觀寶翰亭藏。圖版取自《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9，冊 36，頁 26、53。
- 圖 6 元元統元年（1333），鐸爾直，跋魏了翁〈文向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書譜叢帖》，香港：書譜社，1977，輯 3（8）。

A Study of Imperial Calligraphy Bestowed by the Yuan Emperor Wenzong with “Yonghuai” and “Record of the Kuizhang Pavilion” as Examples*

Liu, Hua-hua**

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emperor Wenzong (Tugh Temür, 1304-1332; r. 1328-1329, 1329-1332) was a highly sinicized and cultured ruler. Judging from the research of previous scholars,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Wenzong excelled at calligraphy, which has often been used as proof of his level of attainment in Chinese cultivation but rarely examined from the viewpoint as art.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as its focus the “Ink Rubbing of Two Characters ‘Yonghuai’” from the third day of the first month in 1331 as well as “Record of the Kuizhang Pavilion.” Examining the contents, style, and recipients of these two works of calligraphy points further to uncovering and discussing the purposes to writing and producing imperial calligraphy,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its style, a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warding it as a way to explain the rich and broader significance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convey.

The research here shows that the two above-mentioned works of imperial calligraphy reveal the notion of filial piety in rulership and the way of the ruler. In terms of their style, Wenzong used the method of copying to connect himself with a previous “sagacious ruler” in the Tang dynasty, Emperor Taizong (Li Shimin, 598-649; r. 626-649), thereby effectively enhancing his own imperial prestige. And through the awarding of imperial calligraphy, Wenzong not only spread imperial grace, he also could receive at the same time the loyalty and gratitude of his high officials. This functioned to mold the value of loyalty in them and helped construct the image of Wenzong as an enlightened ruler.

Keywords: imperial calligraphy, imperial bestowment, Yuan Wenzong (Tugh Temür), Kuizhang Pavilion, Yonghuai, Record of the Kuizhang Pavil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Received: 23 April 2021; Accepted: 22 April 2022

**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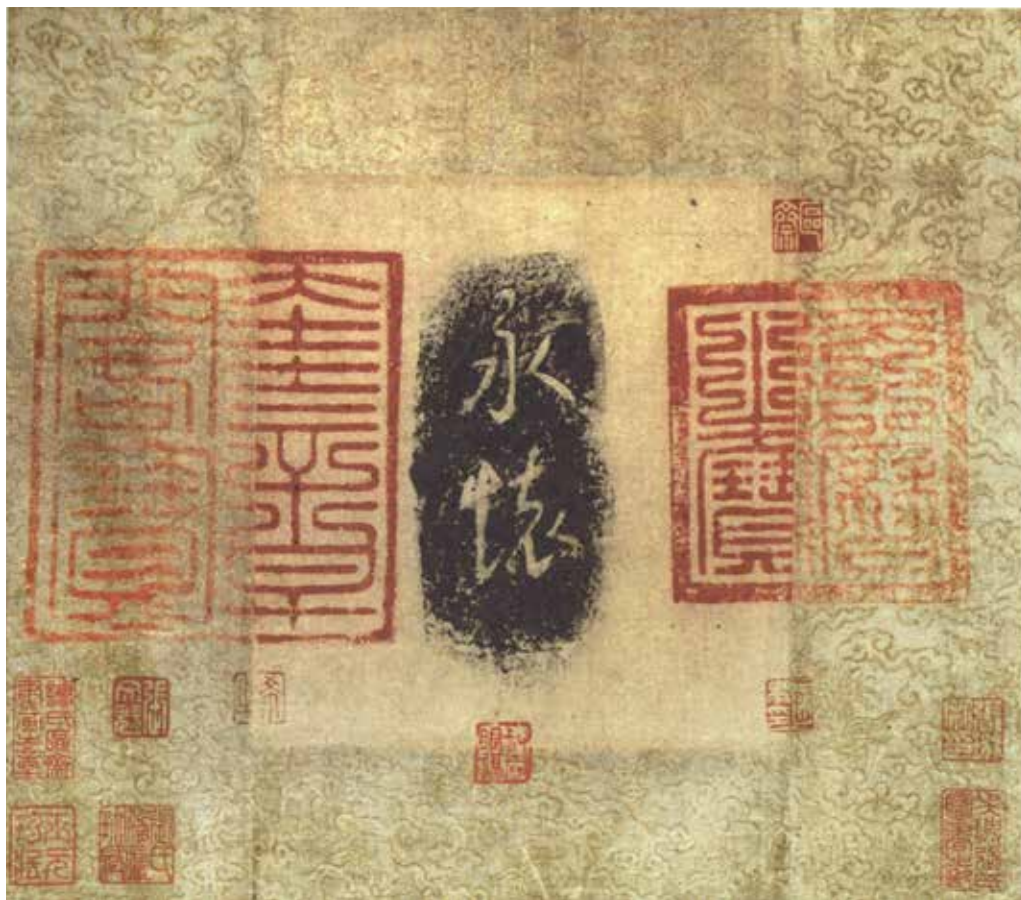


圖1 元至順二年（1331） 元文宗 〈永懷二字墨拓本〉卷 局部 1331年 美國私人藏家藏

五代南唐 趙幹〈江行初雪圖〉卷 「天曆之寶」印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 〈梅竹聚禽圖〉軸 「天曆之寶」印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至順二年 元文宗〈永懷二字 墨拓本〉卷 「天曆之寶」印章 美國私人藏家藏

圖 2-1 奎章閣收藏印「天曆之寶」

宋 〈梅竹聚禽圖〉軸 「奎章閣寶」印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 宋徽宗〈蠟梅山禽圖〉軸 「奎章閣寶」印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至順二年 元文宗〈永懷二字 墨拓本〉卷 「奎章閣寶」印章 美國私人藏家藏

圖 2-2 奎章閣收藏印「奎章閣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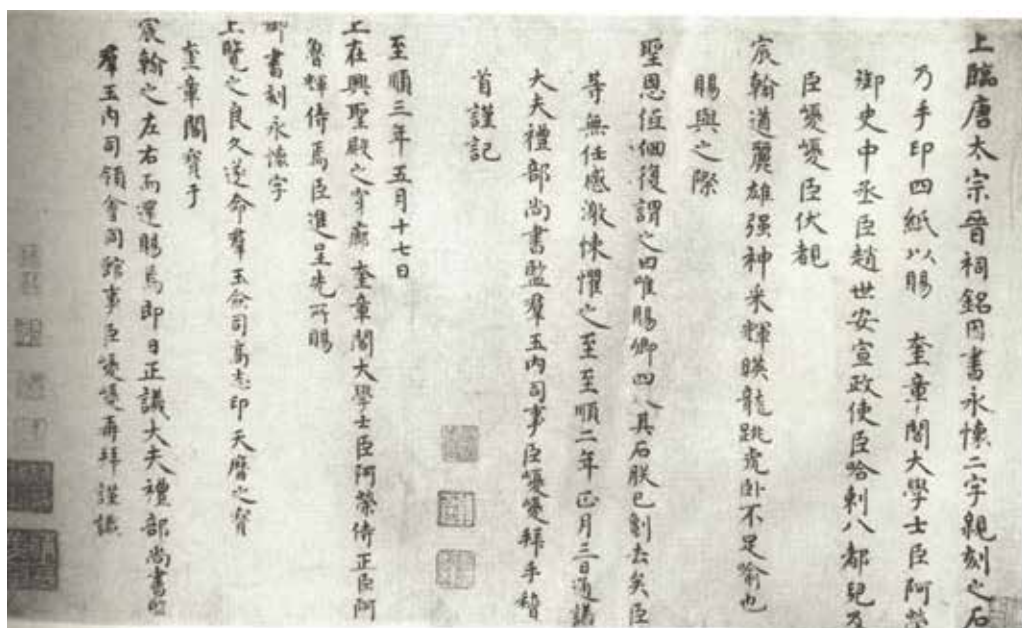


圖3 元至順二年、至順三年（1332） 康里巎巎 跋〈永懷二字墨拓本〉卷 美國私人藏家藏

文 字		
原文	日月有窮，英聲不匱。天地可極，神威靡墜。萬代千齡，芳猷永嗣。	陰澗懷冰，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瀑布之能擬。

圖4 唐 貞觀二十年（646） 唐太宗〈晉祠銘〉永、懷二字 山西太原晉祠貞觀寶翰亭藏



圖 5 唐 貞觀二十年 唐太宗〈晉祠銘〉中永、懷二字 山西太原晉祠貞觀寶翰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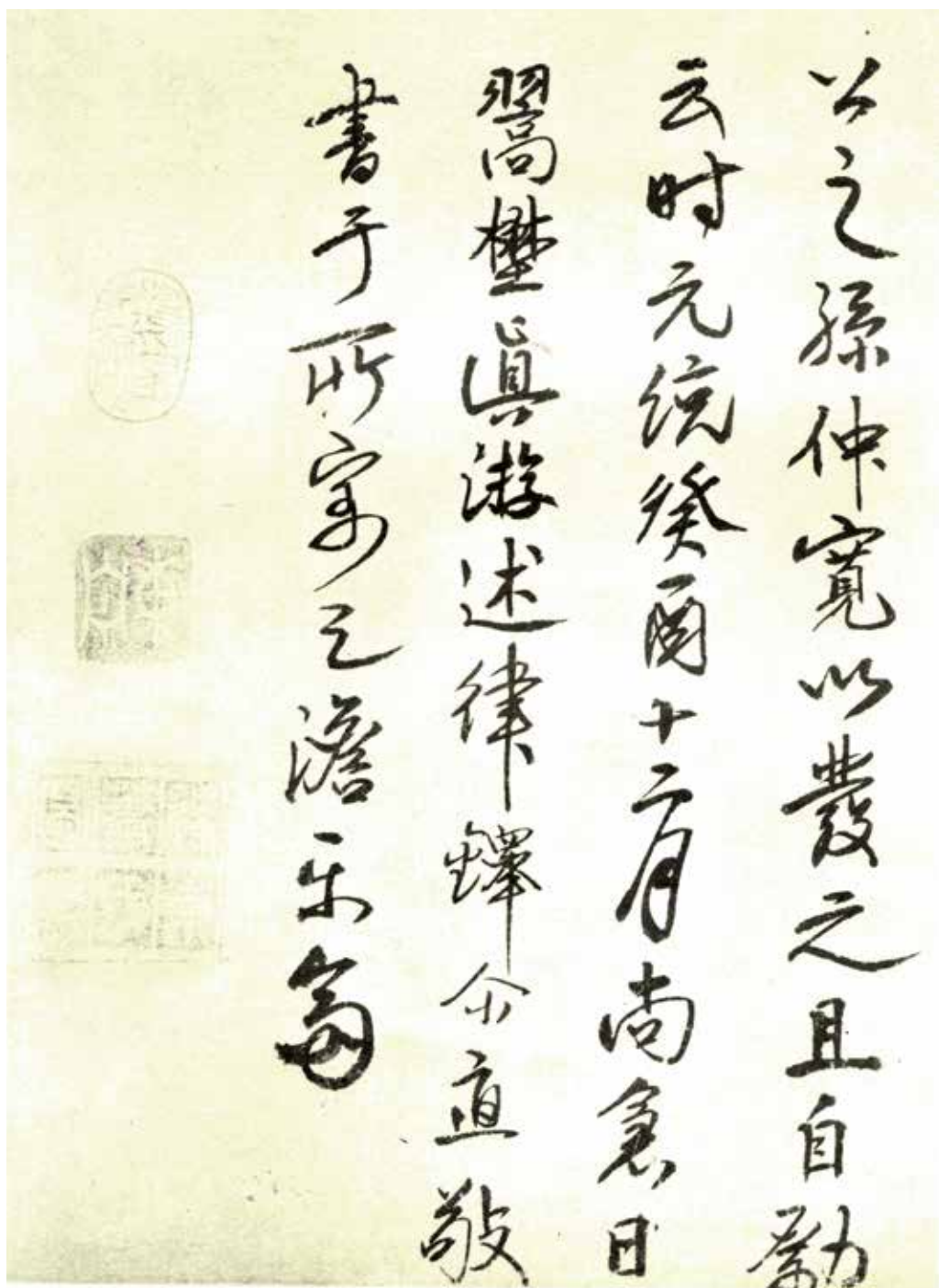


圖6 元 元統元年(1333) 鐸爾直題跋宋〈魏了翁書文向帖〉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